

上海城隍庙·现代视野中的道教丛书

刘仲宇 吉宏忠 主编



护城 兴市 HUCHENG XINGSHI

——城隍信仰 的人类学考察

CHENGHUANGXINYANGDERENLEIXUEKAOCHA

郑土有 刘巧林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护城兴市

HUCHENGXINGSHI

——城隍信仰 的人类学考察

CHENGHUANGXINYANGDERENLEIXUEKAOCHA

郑土有 刘巧林 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护城兴市:城隍信仰的人类学考察/郑土有,刘巧林著.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12
(上海城隍庙·现代视野中的道教丛书)
ISBN 7-5326-1947-8

I. 护… II. ①郑… ②刘… III. 城隍—信仰—研究—中
国 IV.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8020 号

责任编辑 陆海龙 施嘉喆
装帧设计 何香生

护城兴市 ——城隍信仰的人类学考察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55 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100

ISBN 7-5326-1947-8/B·69

定价: 1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3064963

总序

刘仲宇 吉宏忠



道教研究在20世纪的80年代之后，渐渐地升温，到了世纪之末，在某种程度上竟成显学，进入21世纪，则无论是研究的人才、研究的论题、研究的规模，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丰茂。这套《现代视野中的道教》丛书，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问世的。

丛书的特点是“丛”，一本一本独自成书，而又集成一丛，或者许多小丛又汇合成大丛，有如《四库全书》那般的浩瀚。至于集合成丛，有的是围绕一个主题，有些则以形式分类。本丛书的书目，并无一致的主题，从内容上看不到紧密的逻辑联系。其中有谈神仙与人生理想的，有谈宫观的，有谈祭神的，也有说养生，论小说，范围非常的宽泛。如果说有什么统一之处的话，那就是所谈的中心话题都是道教，而在谈论时表现出的现代视野。

(一)

所谓现代，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但又不限于时间概念。确切地说，现代指的是一个历史时代，这一时代，有其特定的



内容，或曰特定的质。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百折千回，历经艰苦卓绝的奋斗，直到上世纪中叶，才比较自觉地将建设的目标与现代化联系起来，提出要建立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目标。但是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却遭到了空前的挫折，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新将在21世纪中叶在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任务提出来，而且很快成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从那时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加速期。短短的二十余年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的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急剧变化，“现代”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郁。现代化的过程带来了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的深刻变化，也引发了人们观念前所未有的巨变。人们眼界的开放，思维的活跃，价值观念的多元，民主意识的提高，都是以往没有过的，甚至于根本就没有想像过的。

所谓现代视野，即是站在现代立场，以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道教，探索道教。

现代视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一切都没有区别地观察和理解外界的思维模式。恰恰相反，现代的人们正好没有这样一个模式，也没有人支持弄出这样的思维模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功绩，就是它促进了人的解放，独立的个人成为社会的公民，享有法律、财产、思想、言论等等的自由和权利。由此



也养成了个人独立思考，对问题独立作出判断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如此一来，想要建立一个全社会所有成员至少是绝大多数成员一致的思维模式根本就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们所说的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待道教，将之纳入现代视野，绝对不是想去制造一种限定的思维框架，将研究的对象按这种框架切块、分类、综合，再加评价。完全不是这样。

所谓现代视野，在我们看来，只是现代人的观察世界的开阔眼界。如果一定要说它有什么特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开放的，它是富有包容性的，它又是流动变异的。

开放意味着前进，意味着面向整个世界。以这种眼光看道教，自然而然地会将它放到全人类的大背景下分析、评价。

包容，就是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文化现象，都会采取兼包并蓄的态度，承认其存在的权力。对于道教的探讨，不会以某一观点为独尊，也不会强制地以自己的价值观在信与不信、灵与不灵等问题上纠缠，而会更加客观地去加以分析。

流动变异，就是现代人的经验世界和意识世界，都是变化发展的，不会停滞在某一点上。现代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现今西方世界和中国人谈论现代、后现代时，都会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生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的现代人，视野中呈现的是一片永恒变化着的图



景。而被收入这样一个视野的道教，其存在，其价值，都会随时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而不会凝固于某一点，也不会以某种权威的结论为绝对的定论。

这是对我们现代视野的理解，也是组织这套丛书的基本心态。

(二)

既然谈到现代的眼光，进一步，我们要谈一下作为研究对象的道教。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之一，如果从东汉时正式形成教团算起，已经有接近二千年的时间，如果从她的前身方仙道算起，时间就更长。这一古老的宗教，穿越时空，经历了无数次的王朝更迭，仍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舞台上屹立着。进入19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她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作为中国传统的一支，也仍具有非常浓郁的文化象征意义。

道教历史悠久，内容极其丰富，而其价值又显得多元，又透着几分神奇，使她对于人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本丛书的编辑，首先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道教，其次也是想通过探讨，去挖掘道教文化的多元价值。对于道教，一方面，是希望用现



代人的眼光对其历史与现实予以评价；另一方面，也希望在她的历史深处，发现出在现代仍有价值的因素，找到古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桥梁。当然，我们说的现代价值，含义非常宽泛，既包括对于现代人、现代社会可能有用的生存智慧，也包括可以供现代人参考的理论经验，以及可以为现代人的审美活动提供的资材。

(三)

我们这套丛书，由上海城隍庙组织编写，联系出版，而请了众多的道教内外学者撰稿。从当代道教自身而言，编辑出版道教研究的成果，也是加速促进自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道教界在久经摧残之后才复苏不久，仅靠自身力量，要想实施，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弥补这一缺憾，较为可行而较易见成效的方式之一，是道教界与教外学者的结合，大家本着共同探讨古代文化奥义、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宗旨，走到一起，取长补短，相互帮助。这套丛书的组织编写，就贯彻了这样一种想法。它们的作者，既有道教界的学者，也有教外的专家，而且更多的还是教外的人士。它是道教界与学术界合作的产物，也是道教界与当代知识分子良好关系的结晶。尊重知识、重视吸



引知识分子，以及与历代的知识精英们建立良好的关系，是道教的传统。

本丛书并非狭义的弘道之书，而是对于道教的学术研究之作。在相互尊重、共同探讨、相互切磋的前提下，各位作者对于自己的观点有充分的阐释自由。这也符合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现代视野的特征。

邀请参与本丛书编写的，有诸多的道教研究方面的专家，他们在自己的学术圈中，各有自己擅长之处。不过，本丛书的编写，是想将有关道教的知识介绍与专业的分析结合起来，即做到通俗性与学术性的统一。为此，我们没有要求作者在深化学术方面放马驰骋，而是请他们将获得的学术成果以尽可能通俗的形式表达。至于表达得如何，则要请读者们来评论。

最后，我们还得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总编张晓敏先生，副社长王岳先生，哲社、宗教文化编辑室主任于鹏彬先生、陆海龙先生，以及诸位责任编辑。因为他们的学术眼光，本丛书才得以纳入出版计划，也靠了他们的辛勤劳作，才使得丛书的问世成为现实。

2005年8月



目 录



引 言 / 1



- 一、城隍神：中国惟一的城市专有神灵 / 1
- 二、城隍庙：中国惟一的每座县城必有的庙宇 / 12
- 三、城隍庙：中国城市的肌理 / 22

第一章 城隍：中国古代城市的守护神 / 25



- 一、城隍神的来历与城市之关系 / 25
 - (一) “地方官→城隍”型 / 26
 - (二) “功臣→城隍”型 / 29
 - (三) “正直者→城隍”型 / 32
 - (四) “行善者→城隍”型 / 34
 - (五) “神能者→城隍”型 / 36
- 二、城隍神的职能与城市之关系 / 37
 - (一) 护城保民 / 37

- (二) 祛灾除患 /40
 - (三) 惩治恶鬼，安抚厉鬼 /49
 - (四) 护佑善者，惩治恶者 /51
- 三、城隍神与地方官吏 /55

第二章 城隍庙：中国古代城市的象征符号 /59



- 一、建筑形态的象征性 /60
 - (一) 松江府城隍庙 /60
 - (二) 安徽绩溪县城隍庙 /61
 - (三) 福建建宁府城隍庙 /61
 - (四) 福建安溪县城隍庙 /62
 - (五) 河北新乐县城隍庙 /62
 - (六) 湖南郴州城隍庙 /63
- 二、展示世俗文化的空间 /67
 - (一) 庙宇空间布局的象征意义 /67
 - (二) 神灵布置的多功能性 /71

第三章 城隍信仰与城市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85



- 一、信仰：心灵的释放 /85
 - (一) 固定的形态 /86
 - (二) 临时的形态 /93
- 二、“三巡会”：全城性的“洁城”活动 /98
 - (一) “三巡会”的产生与发展 /99
 - (二) 城隍主祭坛的形式 /100
 - (三) 城隍出巡 /101
 - (四) “三巡会”之实质 /111
- 三、城隍庙文化：神圣与世俗的融合 /117

第四章 城隍庙与城市经济 /127



- 一、城市：城隍信仰的生成与存在空间 /127
- 二、以庙兴市：城隍庙的商贸功能 /134
 - (一) 城隍庙会的形成 /134
 - (二) 城隍庙会的构成要素 /138
- 三、从镇城隍庙透视城隍信仰与城市经济的关系 /144

第五章 城隍信仰与市民的道德体系 /151



- 一、城隍神的示范意义 /151
- 二、城隍庙的教化体系 /154
- 三、城隍传说的潜移默化功能 /165
- 四、信仰民俗活动的道德警示 /174

第六章 回归的意义——对近几年城隍庙修复及信仰活动恢复的人类学审视 / 179



- 一、本质的衰微：一种历史的必然 /180
- 二、职能转变：此城隍非彼城隍 /188
 - (一) 城隍庙功能的转变 /188
 - (二) 城隍神身份与职能的转变 /189
 - (三) 信仰目的的转变 /189
- 三、城隍信仰复兴：城市记忆与传统的延续 /189
 - (一) 延续城市的文化传统 /190
 - (二) 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需要 /193

引言



城隍庙，是中国惟一只有在城市中才立的神庙，是中国惟一由皇帝颁布命令每一座县级以上城市必须建造的庙宇。这两点就足以说明它与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经济、城市居民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也显示出了它在信仰领域的特殊性。它已不是一个城市可有可无的附着物，而是已成为一个城市的肌理、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城市居民的精神家园。

一、城隍神：中国惟一的城市专有神灵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国的文化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之上，几乎所有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民俗包括宗教信仰等都首先发端于农村、农民。神灵信仰尤其是民间神灵信仰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神灵都是由乡民首先“造”出来的，然后才逐渐渗透到城市，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的道路。然而通常的情况是：民众信仰的神灵进入城市后，广大的农村仍然是该神灵主要的供奉场所，农民仍然是最主要的信众。

只有城隍神进入城市以后，似乎就忘了自己的“出生地”，从此在农村中销声匿迹，成为了城市专有的神灵。在中国广阔的农村中，再也找不到一座城隍庙，成为了中国惟一在农村中没有庙宇的神灵。

城隍神的发展经历了从水塘（沟渠神）到村落保护神再到城市保护神的发展历程。

学术界一般认为城隍神源自《礼记》天子八蜡中的水塘神。《礼记·郊特牲第十一》中记载：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

飨农及邮表、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祭坊与水塘，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



木版画城隍神



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何为大蜡八？郑玄注云：所祭有八神也。许慎《说文》云蜡“从虫昔声，……曰年终祭名者矣”。大蜡八即年终祭祀的八位神，他们是：司啬、百种神、农神、邮表、禽兽神、坊、水墉、昆虫。其中水墉居其七。对水墉的解释，历代学者有一些分歧：

郑玄注曰：“水墉，沟也。”

孔颖达疏曰：“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障水，墉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谓祭此坊与水墉之神。”

《续文献通考·群祀考》三引《春明梦余录》则说：“水则隍也，墉则城也。”黄协埙《锄经书舍零墨》卷一、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五皆持此观点。

从以上材料和考辨看，我们大致可以肯定水墉是农田中的沟渠，水墉神也即沟渠神，古时人们在每年年终祭供他和其他七位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神灵，庆祝农业丰收，感谢他们的恩赐。因此，最早的水墉神原是农田之神，总体而言与城隍神相距甚远，还不能算是城隍神的原型。

真正的城隍神原型可能是由沟渠神发展而来的村落保护神。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牲畜的大量饲养，人类逐渐结束了游移不定的游牧生活，过上了定居的生活，出现了聚族而居的村落。早期的村落，为了生活的便利，往往选择依山傍水之处，尤其是水，是原始人选址的首要条件，几乎是无水不成村。同时，为了防止野兽的骚扰和外族的侵犯，往往在村庄的周围挖一条深沟，围上篱笆。因水墉神人们已经很熟悉，而村落周围的深沟与农田中的沟渠形式相同，因此人们相信同样有沟渠神的存在，但他的功能已成为村落保护神。

从这个角度考虑，城隍神原型在中国出现的时代是相当早



的，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首先，从农业生产的情况看，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已具相当规模，并出现了原始村落。

在吴越地区，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约7000多年)中，发掘了第四层400平方米范围的遗址，普遍发现有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的堆积，厚度从10厘米到80厘米不

等，同时还出土了许多农具——骨耜，仅第四文化层就有76件。通过对谷物的科学鉴定，认为不仅是属于人工栽培的水稻，而且有籼、梗两亚种和过渡类型，属于耜耕农业阶段。^①此外，在浙江桐乡罗家角、杭州水田畈、余杭良渚、吴兴钱山漾、宁波八字桥，上海青浦松泽以及江苏无锡仙蠡墩、吴县草鞋山、南京庙山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均发现了稻谷。尤其是良渚文化(距今约4000—5000年)时期，出现了大型三角形石犁、石耘田器、石镰等，表明已从耜耕发展到犁耕阶段，使精耕细作成为可能，农业产量也因此大大提高。水稻种植已成为当时吴越地区的主要生产门类。

在南部、西南部特别是云南，考古工作者也先后发掘了多处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

①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谷粒和碳化米谷壳，均系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如早在1939—1940年，著名学者吴金鼎、王介忱等人就对大理点苍山的马龙、佛顶、中和、龙泉及白云诸峰的史前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他们的报告中说：“苍山坡上，几经古人居住之地，必有阶梯式之平台……经发掘后，证明此类平台为古人住处及农田两种遗址。此等平台所在，察其周围地形与水源，知其不适于种稻。因是揣想古人所种植者，为适于旱地之农作物。史前遗所在，多为山之缓坡。每址包含四五台至十余台不等。每址居民散处各台上，不相连接。大概当时居民，同一血统，或同一部落者，散居于同一坡上。每家各就其居处，营其附近之农田。”^①可知他们已定居从事原始农业生产，种植的是旱地农作物如梗型陆稻（旱谷）、杂粮等。又如距今约4000年的白羊村遗址中，发掘出窖穴48个，分布于房基近旁，状为圆形、方形或不规则形，多数窖内储有谷类作物（云南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当时的农业已达到了一定的发展程度，出现了谷物的剩余和储存。

在湘楚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水稻栽培。在屈家岭、石家河等遗址的红烧土中，发现了大量稻谷壳。据丁颖先生研究，这些地方在新石器时代所种的水稻是谷粒较大的梗稻，其粒形与现在南方栽种的梗稻相近。^②也有学者认为，楚人是祝融的后裔，擅长以“斧耕火种”形式种粟，后来随着向江汉平原纵深推进，吸收了长江流域的种稻技术，从此种植水稻代替了种粟，水稻成了楚人的主要食物。

在中原地区，属于新石器时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

^① 《云南苍洱境内考古报告》，李庄，1942年。

^② 丁颖《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土中的稻谷壳考查》，《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